

徐雪寒文集



徐雪寒文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徐雪寒文集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14.25印张338 000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1.80元

ISBN 7-5005-0658-9/F·0610

序

薛 暮 桥

徐雪寒同志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我和雪寒同志结交已60余年，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雪寒同志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担任过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参加党的。1928年初，雪寒同志在宁波被捕，移押杭州陆军监狱，和我同在狱中，一起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的难友至今仍以“牢监大学”的“学生”而自豪。1929年12月我刑满出狱不久，在著名学者陈翰笙同志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同志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同志又介绍我到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雪寒同志在1933年夏刑满出狱，和这年冬天刑满出狱的骆耕漠同志，都经我介绍，先后到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中国经济情报社是钱俊瑞、姜君辰等同志在《中华日报》创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每周出版，为了撰写和提高经济论文的水平，需要订阅许多报刊，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和保管，以便于使用。于是，中国经济情报社便应运而生。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所得到的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所以我们在搜集资料同时，必须不断写作。我们掌握的资料相当

丰富，论文的内容也较充实，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我们所写的稿件，除在《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发表外，其它报刊也乐于采用，纷纷约稿，而且篇篇都能发表。为扩大宣传阵地，1934年我们又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紧接着在1935年建立了新书店，由雪寒同志主持。在这期间，雪寒同志显示出了他在宣传理论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

雪寒同志在中国经济情报社撰写和发表论文的时候还很年轻。有人可能要问，一个中学还没有毕业的青年，怎能写出这样高质量的经济论文？我以为答案只有两条，一条是在牢狱中和出狱后认认真真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一条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后者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所严重缺乏的。正如我们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必须从农村调查入手一样，我们研究其他经济问题必须同样搜集和掌握大量的资料。只有从实际出发，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科学地分析研究这些资料，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雪寒同志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了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到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主权；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变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雪寒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一部分著作随着作者学识的增长，愈到后来愈精采，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

中国工业》、《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章，确具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很有价值。

雪寒同志在这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救国会里共产党团的积极分子，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志联系十分密切，他们领导的新知书店成为救国会活动场所之一。新知书店最初由雪寒同志担任经理，华应申同志担任副经理。从穷文化人中集资2000余元开办，一间办公室白天供从事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之用，晚上当宿舍，几个工作人员大家打地铺。他们的工资不但很低，连房租也由工作人员分担。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知书店除了定期出版《中国农村》月刊，还结合当时形势，陆续出版了《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通俗经济学》、《大众经济学》等著作。我写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也是新知书店出版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知书店在雪寒同志经营下，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业务迅速发展，成了白区经济学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新知书店从建立的一天起，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35年在上海创业时期，它直接受党的中央文委领导。1937年12月迁往武汉以后，长江局的出版机构——中国出版社的书刊都由新知书店负责出版和发行。新知书店一跃而成为在全国拥有十几家分店的大书店，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根据地，新知书店也陆续设立了分店。通过新知书店这个重要的渠道，根据地的广大干部有机会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食粮；根据地的许多著作，包括我在抗大所著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新知书店也得以在大后方、敌占区和香港等地以及海外广为传播。直到新中国诞生前夕，新知书店和邹韬奋、李公朴等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和

读书出版社在香港合并，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提供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作为书店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雪寒同志，他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的一天来到了”，雪寒同志奉命去华北战区考察、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村工作，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连续发表评论，阐述战争形势，提出粮食储备、武装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征兵和动员乡村小学教师等等问题。1938年1月16日，他发表了《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一文，建议上海和江南地区的爱国青年不要都到武汉等地流亡，而是要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打击侵略者。在新四军筹建之际，雪寒同志发表这样的主张，是颇有远见的。在此前后，我受陈毅同志委托，也曾在1938年1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撰文提出同样的主张。记得陈毅同志曾说，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在上海、南京一带丢下了三四十万支步枪，如果上海的党组织不是动员一二万爱国青年到后方去，而是动员他们组织农民捡起这些枪枝，建立游击部队，那么，东战场的抗战力量势必大为加强。雪寒同志的主张，是符合陈毅同志的战略思想的。

1943年雪寒同志到根据地工作，曾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实际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据地发行“抗币”的经验，指出“抗币”的发行数量只要能按市场需要而进行适当调节，使货币量符合市场的流通需要，那么就可以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南京伪政权滥发伪币，币值狂跌，物价猛涨。但根据地物价，由于控制“抗币”发行数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抗币”币值稳定，人民乐

于使用“抗币”，所以能把法币、伪币驱逐出根据地市场，还能渗入敌占区。1943年初，我去山东根据地工作，也曾奉命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同雪寒同志的经验不谋而合。我所写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见《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一文，也谈到这个问题。在我国北方的几个根据地中，华中根据地是物资最丰富的地区，贸易大量出超，如果不坚持由“抗币”独占市场，那么，出口的大量物资换回不断贬值的伪币和法币，遭受的巨大损失将难以估量。

1946年春到1948年夏，雪寒同志奉命在上海、香港一带为党建立一批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也更加丰富了他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和知识。

上海解放后，雪寒同志随军接管对内对外贸易工作，与吴雪之、卢绪章等同志一起，通过市场斗争，打击了货币投机商及大米、纱布、煤炭的投机倒把活动，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作了大量工作。随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9月，雪寒同志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为整顿华东地区的铁道运输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雪寒同志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我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雪寒同志，1955年发生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潘汉年同志奉党中央命令，多年来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卓著功勋。不幸在1954年冬，竟被错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而被捕入狱。雪寒同志因与汉年同志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1965年提前假释出狱。因刑期未满，同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往来。十年动乱期间，雪寒同志又被送进“牛

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打倒了“四人帮”，情势缓和下来，1977年冬被批准回到北京。1978年3月，许涤新同志在胡乔木同志支持下，延聘雪寒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经济研究》杂志编辑。其后，汉年同志冤狱平反，雪寒同志也有幸得以昭雪。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雪寒同志随之恢复了党籍。这时，我请他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雪寒同志发表的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决不是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近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对于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他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卓越的见解。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一文，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项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减少很多困难。

这里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83年国务院采纳了我们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委托经济研究中心组织银行界来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各专业银行意见分歧，争论很多。雪寒同志耐心地分别听取了汇报，又到上海充分倾听了各种意见，然后向国务院提出了综合性的报告，以供采择。同时，他还发表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一文，阐述了他的观点。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也是几年来争论不决的问题。我国对外贸易长期来由对外贸易部独家经营，出口企业对世界市场都不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允许地方和少数企业直接经营，但又产生多头经营，互不通气，以至在国外市场上出现了互相削价竞销的现象。经济研究中心受国务院委托研究外贸体制改革问题，我们支持对外贸易部统一领导，变多头经营为联合经营的设想。雪寒同志与有关部门通过反

复调查研究，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

《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文章。众所周知，冶方同志从50年代以来，因主张重视价值规律和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因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冶方同志获得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在冶方同志的理论观点遭到批判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都企图以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雪寒同志在1984年发表上述文章，肯定冶方同志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是有矛盾的。继雪寒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在1988年3月，我也发表了《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指出冶方同志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显著的区别。这一情况生动地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前进和创新。我相信冶方同志假使能够活到今天，也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感到欣慰。

雪寒同志近年来还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收录在本文集的有10余篇。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为了悼念比我们去世早的战友，而且忠实地记录了在30年代及稍后一些时期他们的革命活动和生活；两篇是创建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和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内外贸易工作的回忆。有不少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第一手史料。

雪寒同志因为饱经折磨，1978年恢复工作后又日夜操劳，1985年起健康情况减退，但1987年以后仍能写出口问题和体制改革等不少文章。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在同朋友叙谈时常常流露出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但他从来不谈自

己所受将近20年的冤屈。现在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希望他恢复健康，为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8年5月1日

目 录

中国的火柴工业	(1)
蚕业统制之前途	(13)
中国邮政的症结	(19)
积极兴筑中的中国铁道	(25)
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	(31)
列强在华的航空争霸战	(38)
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	(50)
东北农村经济的特质	(56)
中国关税的二重性	(70)
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	(76)
英美共管中国货币吗?	(86)
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	(93)
救济棉纺业危机诸方案的检讨	(99)
中国工业问题	(107)
列强对华投资问题	(116)
中国财政问题	(128)
抗日战争和粮食准备	(138)
时评六篇	(148)
农村工作讨论会应当怎样进行	(168)
论当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172)

华中解放区的货币·····(180)

巩固地发展我国与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188)

调整我国人口再生产的关键性决策·····(192)

评我国三十年来人口理论的研究·····(198)

坚决贯彻农村人口政策·····(218)

谈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223)

关于经济特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226)

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232)

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235)

试论外贸出口的“假亏”问题·····(244)

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计划的总原则·····(254)

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260)

发展商品经济，改造和振兴上海·····(271)

从强化宏观控制入手，搞好综合经济改革·····(279)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288)

当前金融形势和银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293)

关于我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几点意见·····(308)

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316)

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319)

论经济效益与承包经营·····(324)

价格全面改革分两步走为好·····(335)

关于治理整顿的几个问题和建议·····(340)

诗人徐雒同志的一生·····(349)

怀念出版战线的老战友——华应申·····(361)

回忆潘汉年同志二三事·····(369)

学习孙冶方同志的崇高的情操和品德·····	(374)
缅怀于毅夫同志·····	(378)
衡老把一生献给伟大的祖国·····	(383)
韬奋同志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	(390)
回忆与涂新同志五十年往来中的片断·····	(400)
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405)
上海内外贸易系统接管工作回忆·····	(429)
 后 记·····	 (438)

中国的火柴工业

一、历史的简单回顾

中国火柴工业之成为新兴工业部门之一，还不过30年历史。帝国主义势力向中国推进，促成了它的诞生。外国火柴最初输入中国，大约在前清同治光绪之间。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川重庆地方，已经有了第一家国人自制火柴厂；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龙有隆起公司，重庆有森昌正等厂，相继开业，终光绪之世，全国已有火柴厂14家。宣统年间（1909—1911年），新创11家。民国成立以后，这种工场手工式的小规模火柴厂，依旧以缓慢的步调在增加。市场上操垄断之大权的，也由欧洲火柴而转为日本火柴了。

欧洲大战，给予本国火柴工业以抬头机会，国人自设火柴厂，在数量上突然增加。仅1920年一年中，新成立厂家有23家之多，自制火柴在市场上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但是好景犹如昙花一现，随着大战结束，欧洲与日本火柴便排山倒海一般侵入，尤其从1927年以后，瑞典与日本火柴资本在中国狂暴的兼并，使基础薄弱的中国火柴工业陷于生死存亡的苦难中。1932年瑞典火柴大王克罗格的逝世，并不能消除此种苦难，因为接着而来的就是日本火柴之猛烈的倾销。虽然1931年1月所颁布的新税则，对于这新兴的工业起了一些保护和刺激的作用，但是帝国主

义者却从火柴的商品形态的输入，转变为资本的输入，即在中国直接设立火柴制造厂，实际上反而加强了对中国厂的威胁。民族资本家自然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刊物说：“……目下外货火柴，多在中国境内设厂制造，此种税率之增加，几等于虚设”。这是明白地昭示我们，在帝国主义主宰的现存秩序下，殖民地的民族工业不是可怜地缩小再生产，便是完全灭亡。另外，1933年11月所颁布的新统税率，把火柴工业无情地推入全军覆没的危机中，最近半年来事实就明白告诉我们：中国的火柴工业就是在这两种势力的夹攻之下，百般挣扎，维持他们的生命。

二、火柴工业的阵容

火柴本身与人民日常生活有较为密切关系；同时，在轻工业中，它又是技术比较简单，能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生产的一个部门。所以三四十年来，它的发展范围颇为广泛，兹据1934年《申报年鉴》，列表如下：

省 别	厂 数	资本总额（元）	省 别	厂 数	资本总额（元）
江 苏	17	2 382 800	江 西	1	10 000
浙 江	8	950 000	云 南	14	155 000
安 徽	2	300 000	贵 州	4	90 000
河 北	9	1760 000	福 建	不详	75 000
山 东	24	1390 000	广 东	21	674 000
山 西	6	303 000	广 西	1	40 000
河 南	8	280 000	甘 肃	2	15 000
陕 西	2	50 000	湖 南	1	100 000
四 川	23	4 981 000	湖 北	2	500 000

火柴厂之相当地普及各处，据此已可概见。但是就工厂的数量上看来，不均衡发展是很显然的，譬如安徽、陕西、江西、广

西、甘肃、湖南诸省的工厂数及资本总量，还不及山东一省。殖民地民族工业之发展，如何地接近和依存于帝国主义的通商口岸之交通及原料，而作畸形的成长，火柴工业便是一个明白的证明。

资本有机构成的低下，成为中国火柴工业的最大弱点之一。作为全国最大的四大火柴厂所拥有的资本，大中华为2 367 300元，山东振业为100万元，天津丹华为120万元，杭州光华为50万元；而且如大中华公司，事实上乃是由四个公司六个分厂合并而成，所以它的资本数量虽然较多，但其真义实非意味着生产之集中与统一。这情形愈到内地，愈为显著，譬如云南永通、东升、济兴、仁和等厂，资本不过1000元，其微薄实足惊人。

上引表中，关于各省总资本的统计数字，我们还应加以缜密的审别。譬如四川一省的资本总数，竟超过了江苏、河北、广东三省的合计数，仅从常识来判断，也可推断其有失之过大或过小的毛病。同时，若根据上表来计算每厂平均资本额，多少对于贫弱的火柴资本总加上美丽的粉饰。然而平均数最高的河北每厂尚不曾超过20万元，有八个省份的每厂平均资本，倒有5万元以下的。下面的表，是根据《中国经济年鉴》所载，142家不论已停或未停的火柴厂（其资本可得而知者）归纳计算而成，它不论对于历史的或是当前的状况，都可供我们作个概略透视：

40万以上至120万元为6家；10万以上至40万元为11家；5万以上至10万元为38家；1万以上至5万元为60家；1000元以上至1万元为27家（大中华公司分厂分别计算）

在全数142家工厂中，10万元以下的竟占总数88%以上，就中，1万元以下的厂家所占的比重，又比较巨大。资本有机构成这样低下，使火柴工业部门比其他先进工业如面粉生产等，更多